

纪念

衡文玉尺 不老雷达

高洪波

雷达走了,走得这样突然、迅速,走得这样不由分说,和他平常的性格一样,像一个躲猫猫的老顽童,一下子藏起来了,藏到一个幽深黑暗的世界里,然后用他那双顽皮而智慧的眼睛望着你,说道:老朋友,再见!

雷达是我40年的老友、文友、球友和藏友,我们是同年同月进入的《文艺报》,1978年8月,我从云南军旅复员回北京,他从《中国摄影》杂志调岗,在这个月回报社的还有下放山西太钢原《文艺报》的老人唐达成,当时“右派”帽子还戴在头顶。我们共同的领导是冯牧与孔罗荪,办公室在东城区礼士胡同一个大宅院里,据说清朝时是刘罗锅旧居,后来也曾是印尼驻中国大使馆,最后住着“文革”红人于会泳,而于会泳的生命也是在这里终结的。在这样一个有故事的地方,开始了我和雷达的相识。

我和雷达有5年间在同一个文学评论组,组长是刘锡诚,组员有郑兴万、吴秦昌、阎纲、李炳银、孙武臣和稍晚些的于建、吉敬东,那是个思想解放思绪飞扬和灵动的青春岁月,文学界桩桩件件大事都与《文艺报》相关联,雷达也在这个时期脱颖而出。他勤奋、多思、善学,目光四射且穿透力极强,更难得的是雷达有一颗童心,较真、倔强,一旦认准的事,肯定做到底,他的毅力让我佩服不已。记得诗人李季突然去世,雷达写了一篇纪念文章,题目定不下来,征求我的意见,我说叫《泥土与石油的歌者》如何?雷达当场认可,文章就这样发表了。

与雷达40年相处,我们几乎无话不说,也从不说防,我们的文学观念相似,业余爱好相同,性格也有些近似,爱开玩笑,喜欢幽默,打乒乓球可以一打半天,下象棋可以一下一夜,看足球比赛边看边打赌更是常事,许多作品都是在这平常交往中交流的,我的阅读量大,速度快,看到好小说就告诉雷达,譬如新疆董立勃的中篇小说《白豆》就是闲聊时告诉他的,雷达对我的话相当信任,找来一读,马上力荐,我管雷达叫“衡文玉尺”,我是他的业余信息员,雷达很认可。有一次我说起当前不少作品好看,但肤浅,让人有阅读快感而没有阅读记忆。雷达听了马上首肯,并说要借这个话题写文章。我说版权归我,使用权归雷大师。虽然是玩笑话,雷达还真的就此发表过文章。

因为有11年同住一个楼,由同事好友进而成为近邻,我和雷达、彭加瑾三个报社老友转换为最密切的乒乓球友,有几年差不多每晚都切磋一下,有时还组队外出挑战。比如去军艺大战朱向前,去《求是》大战赵光。雷达打乒乓球的风格如同他犀利的文风,迅猛快速,从不输,所以和雷达打球成为我从精神到身体的双重享受,自始至终的幽默和调侃,从头到尾的笑声,如今想来真是恍若隔世。

雷达曾有冬泳的壮举,他一直想引起我的兴趣同泳,我最后还是没有决心下水。雷达不但乒乓球技略逊于我,但有一年突然球技大长,细问才知是上了中央党校。于是,我努力争取也成为他的党校师弟,把球技优势保持到最后。

雷达有一个有趣的社会职务:广东东莞一个镇上的作家村长,他认真对待这份工作,从启动仪式到周年纪念都叫我捧场,由于雷达的人脉广,天南地北真人驻了不少作家,后来他想让我接替村长一职,可我天性疏懒,一直没有应允,想想真有些愧对老友。

雷达走了,40年交往,一朝中止,内心痛楚无以言表,雷达的这种离世方式真像他的恶作剧。我在不久前读他一批精美阔大的散文,还开他的玩笑,说老兄你“侵略”意识太强,让专业散文家没饭吃,雷达笑得很天真、很得意。仅凭这一点,我相信另一个世界的雷达会一如既往的深刻和智慧,幽默和风趣,以生命为玉尺衡量文学与人生,所以我说:不老的雷达。最后把即兴悼雷达兄的一首小诗作为此文的收尾,诗云:兵坛文坛两相知,孰料一朝竟永辞。精进猛士九天上,犹存佳句伴诗思。相信雷达兄在另一个世界看到了,会微笑着说:洪波,你这个小老弟,还真懂我。



写给雷达

麦家

为了《晓晓板》,我最早的一个千字小说,发表在上世纪80年代《解放军报》副刊,我已经忘了我当时的笔名,但忘不了雷达的评语:只有五行字,三个指头盖得住,却30多年盖不住。为了2002年10月的一个雾蒙蒙的下午,当时我在鲁迅文学院首届中青年高级研修班进修,同学陈继明带我第一次面对面见到了盛名之下的雷达:旧沙发,小茶几,千年以上的断砖、残瓦、陶罐,陪我聆听教诲;他木刻阴沉的黑脸,浑厚磁实的声音,持续地盛在一只心灵里,一面镜子中。为了一句话,他说:麦家,作家是写出来的,你已经到写出好作品的年纪,我等你好作品来见我。为了《解密》,这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,它奇形异状,陌生的图案色彩令人目眩,有人怀疑这是涂鸦,雷达说这是黑马,一言九鼎,登上当年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一名。为了《麦家的意义与相关问题》,不到两千字,我在一年多后无意中从网上看到:我感激这种相逢,在人车拥挤的时间、空间,一条冷巷,一枝玫瑰(带刺的)静静地为我绽放。为了一个劝告:我觉得,如再多一些“人间气”和“血肉感”,对麦家也许是重要的;毋庸置疑,这对我是精准的慈悲,我急需的照

耀。为了文学,业如其名,他是中国文学的“雷达”,一辈子的等待、一辈子的守卫:忠诚和坚持折射出他超人的天赋和爱。为了正直,听说他有一种战士的精神,子弹时刻上膛,随时可能对“敌人”击发。为了清脆,听说他有一颗孩童的心,天真、明亮、脆弱、简单,乒乓球都找得到他内心的钥匙,因为那里面没有结构,镜面一样平坦、亮堂。为了80岁,这是现在在北京人的基本寿命,他过早闭紧了眼帘,再也见不到黎明曙光。

为了这一切,今天我很悲伤。我正在写一部对我来说罕见地具备“人间气”和“血肉感”的新作,也许不久即可交付读者,但它已遇不到那双眼睛:灵敏、犀利、宽广、精确,带着体温的,附着法力的,“雷达”一样的。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减弱我的悲伤,我只知道写下这些是方式之一。除此外,我也愿意采用其他方式,让酒渣色的悲伤,像酒精一样随风飘散。别了,雷达老师,你是可安心去,因为你的过往精彩纷呈,你的去向只有一个地点:天堂,那里仍旧是有文学的——不是有人说,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。同时也要谢谢说这话的人——博尔赫斯——借给我减弱哀痛的灵感 and 样式。

永存的“电磁波”

潘凯雄

3月31日。

傍晚看到老同事、老朋友、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于是日下午3点仙逝的噩耗,不相信!不敢问也不便问!怎么可能?那个有些倔强与好胜的西北汉子怎么可能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走?两个多月前,我还和他一起参加了研讨会,雷达的发言其声虽不及以前那般洪亮,但对作品评点的细读和坦率仍一如既往,也没听说他患有致命性的疾病,怎么可能如此这般说走就走了呢?接下来的一段时间,微信朋友圈中刷屏的几乎都是雷达走了的消息与痛惜:

雷达真的走了!

35年前,我刚走出大学校门,也知道了自己的下一站就是《文艺报》,于是悄悄地抱着《文艺报》合订本提前做起了功课,雷达的大名就这样进入了脑海:文章的话题基本围绕着那时的中篇小说新作展开,或单篇作品的评论,或一类中篇小说的述评,文字干净、见解不凡。到了正式走进当时还位于沙滩北街2号大院内抗震棚中那简陋的《文艺报》办公室,才正式与雷达其人对接上了脸。那时刚步入不惑之年的雷达(有的同事还直呼其本

名:雷达学)虽然还只是《文艺报》评论部负责中篇小说板块的一个普通编辑,但已是文学界颇有影响的青年评论家之一了。

当时的《文艺报》有一个令我迄今难以忘怀且感念不已的月度“三会”制,即每月一次的选题会、阅读交流会和出差汇报会,选题会不用说了,而阅读交流会和出差汇报会其实就是将个人的所读所思、所见所闻与大家分享,用后来的时髦话讲,每一次“三会”无异于一场头脑风暴,而雷达每每就是这一次次头脑风暴的积极参与者和“鼓噪”人之一。在我的记忆中,每逢这样的场合,雷达从来就不是缺席者和失语人,每次发言的开场不是“我来说两句”就是“我有一点不同看法”,接着就是他西北普通话的滔滔不绝了,就这样,雷达之文与雷达其人我的脑子里深深地合二而一了。

当时的《文艺报》可谓人才济济。老一代执牛耳者如冯牧、孔罗荪、唐因、唐达成……中流砥柱者如谢永旺、陈丹晨、刘锡诚、吴秦昌、钟艺兵……青年才俊则有雷达、孙武臣、高洪波、彭加瑾、何孔周、晓蓉……再接再厉才是贺绍俊、朱晖、张陵、杜家福……这一拨刚刚

步出校园的“小青年”。在这样一群先后都被称为“××家”的海洋中,雷达肯定不是天资最好的,但依然能够脱颖而出且卓尔不凡,其秘诀在我看来不外乎勤奋、执著两字,其生前留下的《小说艺术探胜》《蜕变与新潮》《文学的青春》《民族灵魂的重铸》《传统的创化》《文学活着》《思潮与文体》和《雷达观潮》等八部论著既是雷达贯穿于新时期文学40年的坚实足迹,也是我之说雷达勤奋执著的铁证。

雷达走了!回想自己与之相识的35年,说不上深交,也没有一次长谈,或许只是“××之交淡如水”,或许就只是相识。在《文艺报》共事的11年,他是我们这一拨“小青年”的兄长,留下的多是“关心”的印记;再往后的9年,我与文坛基本“失联”,这段时间每次偶遇雷达,他总是充满关切地问:“你还好吧?”我心里自然明白他想说什么,但也只能回答“挺好的”;再后来我“宿命般”地“轮回”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,与文学界的联系又多了起来,雷达也经常作为嘉宾出席社里组织的各种文学活动,这时的我已很少写作文学批评的文字,但即便是这少之又少的文字也难逃雷达之眼,因此,最近这16年他留给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你工作那么忙,还能写评论,真不容易”,他想说什么我心里依然知道,但还是只能回答“哪里哪里”。

现在,雷达走了,他再也不会“表扬”我了。文友白桦痛叹:“文坛从此无‘雷达’”,而我更想说:“电磁波”永存!雷兄走好!

第一感受

想象历史的方法

张玉珠

小说可以虚构,这是小说这一文体的特权。这一点,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会知道。但是,在处理历史题材时,小说家可以虚构吗?如果可以,有没有一个需要被遵循的边界?

我相信,王志国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《大辽王朝》时,肯定也遇到并思考过这一问题。否则,他的这部作品不可能呈现目前这样坚实而丰满的面貌。作品从契丹族的发祥起笔,中经大辽建国、达至鼎盛,一直写到大辽帝国走向衰败、灭亡,皇皇42万字,前后跨越200多年,读来却丝毫没有枯燥和倦怠之感。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,在我看来,主要原因就是作者很好地处理了文学和现实的关系,具体说就是作品兼具了文学的丰满和历史的真实。

应该说,对于历史上的契丹族以及这一民族创立的大辽帝国,大多数人与我一样,并不十分熟悉。史书或文艺作品即便偶有涉及,也多语焉不详。契丹族发祥并主要活动于东北地区。作为一名东北籍作家,王志国就地取材,再现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,书写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历史歌哭,应该说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。

小说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时,当然可以“只取一点因由,随意点染,铺成一篇”,但是,王志国没有这样做。他没有虚无历史,也没有将历史作为娱乐消费品,而是选择用一种艰难而“笨拙”的方式来处理历史,即尊重历史本身的方式。我相信,为了创作《大辽王朝》,作者肯定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,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。

整部作品气势恢弘、格局庞大,不但完整呈现了契丹族的发展史,而且还涉及到了辽与北宋、辽与金、契丹与党项等诸多错综复杂的关系。纵览全书,作品中的很多情节在史料中均有据可查,正所谓“大事不虚”,也使作者“想把一个相对真实的大辽国展示给大家”的创作意图得以实现。作品的严谨之处还体现在,即便是一些非史实的细节,作者也没有随意杜撰。比如关于契丹族的起源问题,作者就采用了契丹人关于自己始祖的传说,即“青牛天女”与“白马仙人”结合繁衍的故事。

更为可贵的是,除了尊重史实、以史实为本,作者在创作中始终还抱有了一种历史反思精神。作者并不满足于还原一段历史,他有更深沉的追求,希望透过历史的迷雾,探求历史背后的真相和规律,进而让历史成为当下的镜鉴。在作品结尾处,作者借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口,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:契丹人当年立国兴邦,开疆拓

土,甚至马踏中原,逼得北宋签订“澶渊之盟”,可谓辉煌一时,为什么最终落花流水、国破家亡?完颜阿骨打总结了4点原因,核心观点是“契丹人不是输在我们手里,而是败在他们自己的身上”,可谓一语中的,入木三分。这种历史反思精神,其实是在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历史真实。

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同时,作品并没有被历史本身所束缚而丧失文学的丰盈。说到底,文学创作不可能是史料的堆砌与缝合。在小说家手中,史料再多,也仅仅是没有温度的素材。文学的价值是给人温暖和感动。《大辽王朝》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章节,是对契丹萧太后萧绰与“大辽国第一勇士”韩德让的形象塑造。在《大辽王朝》中,萧韩之间的爱情并没有成为吸引眼球的噱头,更没有让严肃的历史叙事让位于浅薄的男欢女爱。当初萧绰与韩德让由于机缘巧合而一见钟情,进而情定终身。不料,萧绰被征入宫,封为贵妃,一段姻缘就此破灭。不过,在内心深处,两人一直深藏着对彼此的爱。虽然后来韩德让也入朝为官,甚至官至宰相,但在情与理、家与国之间,两人始终坚守着最理性的选择,一个全心侍君,辅佐皇帝成就大辽伟业;一个南征北战,功勋赫赫,成为大辽国的中流砥柱,却始终孑然一身。景宗皇帝驾崩之后,按照契丹族夫死再嫁的传统,萧韩完全有理由有情人终成眷属,但是,为了大辽国的万里江山,为了契丹族的和谐稳定,两人仍然固守精神之恋,不越雷池半步。这种建立在家国情怀之上的牺牲精神,既赋予人物人性的光辉,让作品有质感、有温度、有情感,又让人产生荡气回肠的崇高审美感受。

事实上,《大辽王朝》在处理历史题材时所兼顾的历史真实与文学的丰盈,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已有很好的典范。当下的历史题材创作,真正兼具历史之“真”与文学之“美”的佳作还为数不多。某些作品或者置真实的历史事实不顾,穿凿附会、胡乱编造,虽然在文学性上可圈可点,但因为失却了历史之“真”,所以文学之“美”也就沦为虚幻,只剩下可怜的娱乐之用;或者囿于史料,深陷在历史事实之中不能自拔,缺少驾驭史料进而赋予其文学属性的能力,其结果就是徒有历史之“真”,而无文学之“美”,最终形容枯槁、干瘪无味的“真”也丧失了被亲近的魅力,无人问津。王志国的《大辽王朝》,在历史之“真”与文学之“美”的兼容性上,还不能说已经臻于至臻,但起码方向是正确的,这种努力值得肯定和赞赏。

评论

江苏新诗发展的理路和气度

——读《江苏百年新诗选》 程继龙

近年来,关于新诗“百年”、“地方性”的话题热了起来,胡弦、王珂、何同彬、傅元峰等编选的《江苏百年新诗选》应运而生。诗选分为上下两卷,近千页,共收入309名诗人的598首诗作,以宏大的规模展示了百年江苏新诗发展的理路和气象。

“江苏百年新诗”指自1917年新诗诞生至今,江苏籍诗人和长期在江苏生活、工作过的诗人所创作的新诗,这就以开放的态度和相对确定的标准界定了“江苏百年新诗”的构成和范围。籍贯在江苏和生于江苏,这类诗人比如刘半农、俞平伯、卞之琳、余光中;长期在江苏生活、工作过的,比如吴奔星、纪弦、郑敏、马永波、张作梗等。另一方面,这部诗选渗透了“流派”意识,一个或大或小的诗歌流派、诗人群落成为构成江苏百年新诗地图的小板块。比如所选刘半农、俞平伯是初期白话诗的代表诗人,叶圣陶、朱自清、刘绶陵是文学研究会诗人群的主要成员,卞之琳、纪弦、郑敏、郑敏、唐祈等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主义诗潮的弄潮儿。丁芒、闻捷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歌颂新中国、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名的夜莺。赵偲等人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抒写现代性感受、新的时代精神的旗手。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、在诗歌花园的每一条分叉的小径上,都云集着、行进着江苏诗人,他们推进着百年新诗的进程,完善着江苏新诗的图谱。

诗选还展示了百年江苏新诗的审美风貌。审美风貌是诗歌题材、写法、风格、背后的观念等所综合呈现的美学上的基本倾向、特征。这些特征内化在作者创作过程中、文本肌理中,也体现在编选者的编选意图中。这些特征首先表现为强劲的先锋性。刘半农和胡适等同一道力图扭转中国古典诗歌的强大传统,身体力行地实验“白话诗”,倡导增多新诗体,且较早地通过吸收民间歌谣等因素给新诗

输入了地方色彩。宗白华在“小诗”的路上走得很远,仿佛天末流云、阳春白雪,瞬间的情景感悟融通了奇异的禅思体验。卞之琳和戴望舒同路而不同行,以别样的方式推进了智性化写作的理路,且苦心孤诣地沟通了中国诗学的“意境化”和西方现代诗学的“戏剧性情境”。韩东引领了第三代诗歌的潮流,他所奉持的“诗到语言为止”、“口语”、“民间”等立场均成为当代新诗的重要写作伦理。沈浩波、尹丽川等“下半身诗歌”实验者在新世纪初以极端反叛的姿态挺进了当代诗坛,进一步强化了当代新诗的“肉身感”和“在场性”。先锋是对一切陈腐传统的嘲弄和废弃,突入现代人的生命体验领域,进入当下生活的现实细节,将这一切和新诗这一“伟大而粗糙的发明”(沈奇语)结合起来,推进中国人精神上的现代化进程。

其次,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人文精神。曹雪芹说苏州一带是“花柳繁华地,温柔富贵乡”,其实整个江苏都浸润在丰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。知往事而追来者,历史文化是新诗扎根的土壤和生存的血脉,高度自觉的历史文化要素进入现代生命体验和文体意识,酝酿为充盈的人文精神。方令孺、陈东东、碧子、胡弦、庞培、张维转化和扩大了这种历史人文意识,在审视自我、旁观外物,思考时代的过程中均使用了历史的眼光,放飞了历史的想象。“这乐器陈旧,点点闪亮/像马鼻子上的红色雀斑,闪亮/像树的尽头/木芙蓉初放,惊起了几只灰知更鸟”(陈东东《雨中的马》),连非常西化的以超现实著称的陈东东,在想象一匹“雨中的马”时也流露出古典的意趣,这细腻的雨、柔婉的乐曲、“木芙蓉初放”都带有“六朝文章晚唐诗”的华艳滋味。

最后,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。明清传奇、笔记中常说,天下的明山秀水,集于苏

杭一带。其中,“江南”成为最典型、最核心的地理区域和文化符号。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,“日出江花红胜火,春来江水绿如蓝。能不忆江南”,“杏花烟雨江南”,江南成为历代诗人在俗世提炼诗意的理想之地,在都市皈依田园的最后归宿。余光中自称“广义的江南人,常州人,南京人”,他的深情告白最令人心动,“用十七年来展中国的眼睛/餐餐地图,从西湖到大湖”(《当我死时》),“春天,遂想起/江南,唐诗里的江南,九岁时/采桑叶于其中,捉蜻蜓于其中/(可以从基隆港回去的)/江南/小杜的江南/苏小小的江南”(《春天,遂想起》)。这不仅是在时间意义上对生命原乡的追寻,而且是空间意义上对生命归宿的建构。碧子“有一朵青莲 在水之田/在星月之下独自哀吟”(《一朵青莲》)何尝不是找寻生命之根?漂泊已久的女诗人的人格原型何尝不是江南水田里的青莲一朵。江南文化的核心是柔婉美丽,绵长的阴柔之力,但从来不失顽强刚贞的一面。这也接通了苏北文化气质的慷慨豪放,唱大风的刘邦和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项羽皆为今天意义上的江苏人。徐州籍老诗人郭枫说“任凭时光催剥/看不出老树春秋几许/鳞甲般厚皮裹着/坚实的核心,红彤彤/凝固的火焰一柱”(《山巅一棵老树》),以小说著称的路翎,其诗歌融合了沉思的意味和强烈的现实批评精神,贯通了南北两种气质。江苏诗人合起来展示了江南的婉约和北方的豪放,这是一部复合型的交响乐。

百年江苏新诗诗人辈出、流派纷呈,大有占据百年中国新诗半壁江山之势,堪称百年中国新诗发展的一个缩影。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、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、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,莫不持续地促动、滋养着现代诗心的养成,现代人文精神的塑成。